

洋务运动时期外语教育政策的形成及影响因素研究

樊杰¹ 刘浩¹

(1.宁夏师范大学, 宁夏 固原 756000)

摘要: 洋务运动时期是我国近代外语教育政策从无到有的关键阶段, 也是传统教育向近代化转型的重要时期。面对鸦片战争后复杂的外交局势与洋务运动发展的需求, 清政府逐步构建起完整的外语教育政策体系, 其以官办外国语学堂为核心, 以留学教育为补充, 指导思想为“中体西用”。本文梳理了洋务运动时期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形成脉络, 分析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多重因素对政策制定的影响, 总结了政策实施的历史意义与局限性。其探索为我国现代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也对当代外语教育有一定借鉴价值。

关键词: 洋务运动; 近代外语教育政策; 外语学堂

Formation and Motivational Mechanisms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in the Late Qing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FanJie¹, LiuHao¹

¹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xia Normal University, Guyuan, China

Abstract: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marked a pivotal stage when China's moder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took initial shape, as well as a critical period witness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toward modernization. Confronted with intricate diplomatic circumstances after the First Opium War and the developmental demands of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the Qing government gradually established a comprehensiv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system centered on state-run foreign language schools and supplemented by overseas study programs, guided by the ideology of "Chinese learning as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 Western learning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evolutionary context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in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period, analyzes the impacts of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politics, economy, ideology and culture on policy formulation, and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limitation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explorations in this era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moder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and offer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Keywords: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moder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foreign language schools

作者简介: 樊杰 (2002-)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学科教学 (英语)、刘浩 (2001-)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学科教学 (英语)
通讯作者: 樊杰

一、引言

在十九世纪中期,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战争,西方列强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打开了中国市场,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从此以后中外交往逐渐频繁。与此同时,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兴起,其主要任务是创办近代工业、建设新式军队。跨文化交流难以脱离语言而发生,但是语言差异性的客观存在使得信息的沟通屡屡失真,而晚清中西文化的冲突与对峙正是如此,所以突破语言障碍也是晚清闭关锁国后进行对外交涉不可避绕的关键。^[1]但是,中国的传统教育体系长期以四书五经等为核心,加上科举的观念根深蒂固,导致晚清政府极度缺乏对外交流的外国语言翻译的人才,语言障碍对对外交流形成了巨大的阻碍。

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政府不得不改变传统的外语教育体系,转而探索新的外语教育的路径,由此逐步形成了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外语教育政策。这些政策注重学堂的创办,经历了从萌芽到确立到不断发展的过程,极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外语人才的培养,也开启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作为学科英语专业的学生,探究这一时期外语教育政策的形成与影响因素,不仅可以深化自身对中国外语教育史的理解,也能为当代外语教育政策的优化提供一些建议。本文基于洋务运动的时代背景,结合与此相关的论文,系统分析了洋务运动时期近代外语教育政策的形成过程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并为当今外语教育政策提供一些启示与建议。

二、洋务运动前我国外语教育的基本情况

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前,我国外语教育尚未形成系统的体系,呈现出零星化的特征。以下内容将从我国早期的外语学习实践出发,梳理这一阶段我国外语教育发展从萌芽到确立到不断发展的过程。

(一) 早期的外语学习实践

在鸦片战争之前,我国就出现了零星的外语学习实践如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传教士马礼逊在马来西亚开办英华书院。其办学程度相当于中小学教育。课程包含英语、汉语、数学、天文、地理等。在英华书院后,虽然有清政府的禁令,传教士还是零星来到中国进行传教。他们开办小型学校,进行教

学活动来得到当地中国人对传教士的支持和对基督教的接受。这些学校规模小,师资以传教士为主,生源也不稳定。道光十九年(1839年),布朗为纪念马礼逊先生,在澳门创办马礼逊学堂,又称澳门学堂。这是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学堂。马礼逊学堂的办学模式采用西方教育管理体制和中国传统教育相结合,由于其宗教学校的本质,因此保持着基督教教育的风格。^[2]这些教会学校虽然传播了一定的外语知识,但其本质上服务于宗教传播,且未成系统,没能形成全国性的外语教育政策体系。

(二) 近代外语教育政策的缺失

在洋务运动之前,清政府长期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传统教育以科举制度为核心,强调儒家思想。并且清政府长期视自己为天朝上国,因此外语教育被轻视,并且得不到清政府的认可与推广,仅存在于少数外交事务与各种商贸活动中。

此时的外语教育非常零散,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外语教育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日益频繁的对外交涉中,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外交损失很大。一些有见识的大臣开始认识到“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3]这种政策上的缺失导致了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外交上多次因语言不通而吃亏,这就更加凸显了外语教育的紧迫性,因此在这一时期,近代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极为迫切。

三、洋务运动时期我国近代外语教育政策的形成过程

洋务运动的开展推动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外语教育从零散实践转向制度化发展,在这一时期其政策形成大致历经初创、发展、成熟三个阶段,逐步形成适应洋务运动需求的外语教育政策体系。

(一) 萌芽阶段

洋务运动时期外语教育政策的萌芽阶段以1861年为起点,在这一时期时中外交涉日益频繁,语言文字的隔阂导致清政府在外交事务中屡屡受损,严重影响国家利益。因此,恭亲王奕訢与相关大臣联名上奏,首次正式提出创办外语学堂的构想,标志着近代外语教育政策出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正式进入萌芽阶段,也为后续外语教育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二）确立阶段

1862年清政府批准设立京师同文馆并开设英文馆，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让此前外语教育的政策构想有了实际的落地，打破了传统教育体系中无官方外语学堂的局面。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早创办的外语学校是京师同文馆，这也是最具现代学校雏形的外语学校。该馆首开英文馆，继而增设俄文馆，后又增设法文馆等一系列外语学院，而且其英文教师均来自英美国家。在授课制度上，刚开始的时候各馆上午学习汉文，下午学习英文，只开设两门功课。但逐渐到后来，逐渐扩展到数理化等其他课程。[4]1864年广州同文馆成立，广州同文馆为明确其翻译人才培养目标和奖惩办法，在《开设教习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附章程十五条）中规定：“同文馆肄业生以三年为期，能将西洋语言文字翻译成书者，分别派充将军、督抚、监督各衙门翻译官，准其一一体乡试。其由翻译官出身者，以府经县垂为升阶。旗员愿就武职者，以防御为升阶格。”^[5]这一阶段的外语教育政策具有鲜明的实用性特征，核心目标是解决外交事务上的语言障碍与翻译工作，但是这一阶段的教育政策集中于设立学堂、选择语种与生源划定，尚未形成系统的规划。

（三）发展阶段

随着洋务事业的发展，单纯的翻译人才已无法满足近代工业、军事、科技发展的需求，外语教育政策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如京师同文馆在创办初期，其目的仅仅是为当时的清王朝培养所需要的外交翻译人才，因而同文馆在初期只开设了英文馆，后又因外交需求添设法文、俄文、德文、日文馆，使京师同文馆成为我国近代第一所官办的外语学校。之后，随着洋务运动的进一步推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洋务派意识到“西语”不等于“西学”，仅学习“西语”远不足以达成“以夷制夷”的目的，所以他们提出要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正途科甲人员学习“西学”课程，正式将“西学”纳入“中学”之课程体系。^[6]使得培养目标从翻译人才逐步扩展为培养“西艺人才”，实现了从单一语言学堂向综合型学堂的转型。

这一阶段的政策发展还体现在留学教育的兴起。清政府先后派遣幼童赴美国和欧洲留学。赴美留学成为当时的热潮，因为留学这种学习方式，让人们从传统的书本认识和知识了解，发展到能

够到语言发源地学习，应用机会更多并且更加灵活。这一点间接性地推动了我国外语教育专业的发展脚步，对于以后英语教育乃至整个外语教育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7]

四、洋务运动时期近代外语教育政策形成的影响因素

洋务运动时期近代外语教育政策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从不同程度上推动着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不断向前发展。

（一）政治因素

出于外交的需要：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的入侵与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是我国近代外语教育政策形成的直接原因。清政府在外谈判、条约签订的过程中因语言不通而频繁吃亏，培养外语翻译人才极为迫切。此外，洋务派将外语教育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洋务派首先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主张，而外语教育作为学习西方军事、科技的基础，自然成为了清政府自强的关键学习环节。清政府通过制定外语教育政策，培养外交、军事和技术等方面的人才，本质上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决定了外语教育政策的外导向。

（二）经济因素

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创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与军事企业，这些企业的创办和发展都非常依赖西方的技术，因此，清政府急需既会外语又通技术的人才。此外，近代商业活动的发展也推动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完善。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通商口岸中外贸易日益频繁，因此海关需要大量外语翻译人才，这就促使清政府扩大了外语学堂的创办和招生规模，促进了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

（三）思想因素

“中体西用”思想是洋务运动时期外语教育政策的指导思想，为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思想基础。学堂在培养外语人才时，采用的是“中体西用”的教学思想，积极吸取西方优秀的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本土利用。可以说，“中体西用”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教学思想，让仁人志士开始反思自身原有的教学体系，同时西方思潮的涌入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他们不仅学习西

方的外语, 也通过外语的学习了解西方的思想, 更好地走近西方。^[8] 思想上的成熟加速了外语教育政策的形成发展。

(四) 文化因素

鸦片战争后, 西方各国传教士通过创办学校、翻译书籍、发行报刊等方式传播西方文化, 带来的先进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 成为了外语教育政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教会学校还采用各种先进的教学方法如语法翻译法为洋务学堂的外语教学提供了先进的教学模范, 帮助外语教育政策快速走向成熟。

五、洋务运动时期近代外语教育政策的历史意义与局限

洋务运动时期的我国外语教育政策, 既是中国近代外语教育的起步, 在当时起到了不少积极作用, 也因为所处时代而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以下是其历史意义以及存在的局限性。

(一) 历史意义

这一时期的外语教育政策首次将外语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 建立了从学堂教育到留学教育、从单一汉语学习到中西语言结合的外语教育政策。京师同文馆等学堂的创办, 为此后外语教育的政策提供了借鉴。

这套自上而下推行的教育体系, 为各地新式学堂与海外留学项目持续输送外交、翻译、工程技术类专业人才。在洋务运动期间, 清政府外语教育政策的实施为各地区外语学堂与留学教育培养了很多外交、翻译、技术人才。这些人才活跃在外交、军事、工业等领域, 为外交谈判、工业发展等提供了人才支撑, 促进了洋务事业的发展。

外语教育政策的实施极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 通过翻译西书、派遣留学生, 中国不断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与思想文化, 拓宽了人们的视野, 推动了思想解放。国人逐渐从“天朝上国”的认知中觉醒, 为后续的社会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 历史局限性

外语教育政策从本质上说其实是统治阶级为挽救自身统治而提出的, 因此其制定极大程度上受制于封建等级制度。具体体现在学堂生源初期局限于八旗子弟, 学堂的教学管理中存在官僚作风等方面, 导致政策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政策实施集中于沿海地带与政治中心, 北京、上海等地学堂密集分布, 而内陆地区发展受限, 非常缺乏外语教育资源。与此同时, 学堂招生规模小, 难以满足全国性的洋务事业与外交事务的需求, 外语教育的普及程度较低。

这一时期的外语教育政策过于强调外语的工具性, 以翻译、外交等人才为导向, 忽视了外语教育的人文素养方面的培养。在实际教学中以语法翻译法为主, 缺乏口语交际与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训练, 难以适应中国当时实际交流的需求。学生实际应用英语的能力不强, 是现在我国英语教学与学习的一个重要难题, 不会用外语打电话、不会和外国人流畅交谈、看不懂英文说明书和英文报刊等等是很多外语学习者面临的问题。

六、结论与启示

洋务运动背景下的我国近代外语教育政策, 是在民族危机的压力下形成的。从初期的京师同文馆的创办的设想, 再到后来的学堂培养目标多元化, 政策经历了完善发展的过程。这一政策体系的形成的因素, 体现在外交的需求、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思想观念转型等多方面, 反映了传统教育向近代外语教育转型的艰难探索。

尽管这一时期的外语教育政策存在封建体制束缚、普及程度低、过于注重工具性等局限, 但它开创了我国近代外语教育的先河, 建立了初步的政策框架, 培养了第一批专业外语人才, 推动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对于当代外语教育而言, 这一时期的政策探索提供了重要启示: 首先, 外语教育政策应该兼顾实用性与人文性, 平衡知识与文化的不均; 其次要拓宽外语教育的受众, 打破“精英化”教育倾向, 保障全民平等的外语教育机会。最后要创新外语教学评价体系, 摆脱单一的书面评价模式, 注重口语、写作等实际语言运用能力的训练。从“重笔试”转向“综合能力测评”, 重视口语的考核, 避免出现哑巴外语的现象。学生实际应用英语的能力不强, 是现在我国英语教学与学习的一个重要难题, 不会用外语打电话、不会和外国人流畅交谈、看不懂英文说明书和英文报刊等等是很多外语学习者面临的问题。^[9] 因此需要引导学生通过参加各种外语活动, 达到了学以致用目的, 锻炼外语水平, 如此才能更好地适应国家发展的需求。

参考文献:

[1]汪帅东.洋务运动时期外语教育模式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38(6):115-125,135.

[2]钟孝贤.晚清外语教育与学制管理述论[D].四川师范大学,2018.

[3]肖小龙,王晓忠.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创设[J].许昌学院学报,2007,(1):86-87.

[4]尹怡.试论英语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传播研究[J].兰台世界,2011,(19):34-35.

[5]刘纯.洋务运动时期的外国语学堂与世界意识的开启[J].大学教育科学,2013,(2):89-96.

[6]张必胜,李嘉玲.从“西语”到“西学”:京师同文馆课程改革的历史探赜[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4,40(7):125-132.

[7]申志华,孙国玲.清朝时期旗人教育中的外语教育[J].兰台世界,2015,(6):132-133.

[8]刘杰.晚清时期外语人才培养初探[J].亚太教育,2019,(9):21-22.

[9]雒艳芳.洋务运动时期的外语课程及教学[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25(3):180-182.